

Breaking Free and Self-actualization: On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Volcano Lover*

SONG Yuxin WU Jie JIANG Fangyua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ina

Received: June 5, 2024

Accepted: July 8, 2024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SONG Yuxin, WU Jie & JIANG Fangyuan. (2024). Breaking Free and Self-actualization: On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Volcano Lover*.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107–11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3>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ermeneutic Thoughts of Susan Sontag and Umberto Eco (Project No. 23SKGH118), funded by the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s 2023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gram, and the 2023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tudents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New Sensibility: On Susan Sontag's Against Interpretation Theory (Project No. X2023106170526).

Abstract: Feminism originated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the West and encompasses gender equality theories along with a series of related social movements. Mainstream feminist argues that feminism bega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closely linked to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evolution, and overlooks the many feminist elements that were already emerging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Susan Sontag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oversight in *The Volcano Lover*, where sh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ate 18th-century Italy from a pioneering modern female perspective. The novel narrates the story involving Sir William Hamilton,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Naples, his second wife, the incomparable beauty Emma, and Emma's lover, Lord Nels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Sir William Hamilton's two wives, the mother, and the poetess, exploring how they construct and understand their female identities, thereby demonstrating Sontag's interpretation of feminist identit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enhancing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burgeoning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Keywords: Susan Sontag; *The Volcano Lover*; feminism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SONG Yuxin and WU Jie ar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a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Their email addresses are 3337343990@qq.com and 2362492805@qq.com. JIANG Fangyuan is a lecturer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a researcher at Chongqing University's Umberto Eco Institute,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emiotics, and English education. His email address is superjulien@live.com.



突破禁錮與自我實現

——論《火山情人》中女性意識的覺醒

宋宇鑫 吳 婕 蔣方圓

重慶郵電大學

摘要:女性主義起源於西方婦女解放運動,是性別平權理論和一系列與之相關的社會運動的總稱。主流女性主義研究認為其肇始於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社會經濟文化的自我進化息息相關,忽視了在18世紀末期正在孕育的許多女性主義元素。蘇珊·桑塔格試圖在《火山情人》中彌補這一缺憾,她以現代女性的先鋒視角,系統審視了義大利18世紀末期的歷史文化背景,講述了由英國駐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漢密爾頓爵士,其續弦埃瑪,以及埃瑪的情人納爾遜勳爵之間的故事。本文將聚焦在威廉·漢密爾頓爵士的兩任妻子身上,通過兩人對自己女性身份的構建和理解,闡釋桑塔格對新舊之交女性的自我探索,結合小說中提到的母親、女詩人等「配角」,加深讀者對18世紀末期女性主義意識萌芽的認識。

關鍵詞:蘇珊·桑塔格;火山情人;女性主義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3年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案「蘇珊·桑塔格與翁貝托·艾柯的闡釋學思想比較研究」(專案編號:23SKGH118)和2023年重慶郵電大學「大學生創新訓練計畫」專案「一種新感受力:蘇珊·桑塔格的「反對闡釋」理論研究」(專案編號:X2023106170526)的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是美國著名作家、小說家以及文化評論家,以其先鋒的文化觀點與文學、影視創作者著稱,是20世紀獨具影響力的文化思想家之一,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火山情人》是其傑出代表作之一,也是桑塔格本人最喜歡的作品。小說根據真實的歷史事件與人物改編,以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的義大利半島為背景,講述了英國駐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漢密爾頓爵士,其續弦妻子埃瑪,以及埃瑪的情人、英國海軍英雄納爾遜勳爵三人間的感情糾葛。並以維蘇威火山為喻體,描繪出了一幅涉及兩性關係、國家戰爭、政治腐敗、革命風暴等具有時代特色的歷史畫卷。在現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把主要關注點放在小說的敘事風格、「傳奇與愛情」主題研究、女性角色群像和歷史文化背景上,欠缺對其蘊含的女性主義思想萌芽和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綜合考察。

作為一種宏大理論和社會實踐,女性主義自發端起已風靡世界兩百餘年,發展至今湧現出了如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激進主義的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等流派。與這種社會思潮相伴而生的,除了以波伏娃為代表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便是專研女性主義的文學家及其文學作品。比如英國著名女性主義先鋒作家、意識流寫作的代表艾德琳·佛吉尼亞·伍爾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當代美國作家、諾貝爾獎得主托妮·莫裏森(Toni Morrison)等。許多人認為,哲學和文學通常只是社會現實的「鏡子」,作為社會現象和思潮的反應是滯後的、描述性的,鮮少體現出預見性和普世性,但事實並非如此。偉大的文學作品作為所謂「歷史真實」的記錄,是鮮活的,所有的藝術想象和文學加工都免不了藝術處理,但是這種處理不能簡單地被

處置為「不真實」。恰恰相反，筆者認為，文學敘事的真實常常比有限的歷史紀錄更能反映普遍的社會生活。桑塔格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她與許多更加先鋒的女性主義作家一樣，並不急於表明自己的「女性主義者」身份，相反，她們試圖在自己的寫作中摘掉自己女性主義的標籤，把這種包裹著「追求平等」內核的思想實踐向歷史深處和未來延展。

桑塔格在《火山情人》中考察了遠在女性主義運動之前的 18 世紀歐洲，試圖弄清仍然處在父權的規訓與壓迫之下的女性如何突破禁錮和自我實現。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說「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西蒙·德·波伏娃，陶鐵柱，1998：309）。^{①②}本文將焦點放在女性主義的「史前史」，通過漢密爾頓爵士的兩任妻子對自己女性身份的構建和理解，母親、女詩人和王后對加諸自己身上的枷鎖的反抗，探索這個時期的女性從對父權的反叛到實現自我的過程，以期更深入地理解《火山情人》中女性角色的塑造，以及她們的獨立性和自由意識的價值。

二、對傳統女性角色的掙脫和反抗

《火山情人》中漢密爾頓爵士的兩任妻子可以被看作是傳統女性和新女性的典型代表。第一任妻子凱瑟琳是外人眼中賢良淑德的好妻子，而第二任妻子埃瑪則被視為水性楊花離經叛道的妖豔婦人。凱瑟琳出身高貴，才華橫溢但思想傳統。自從嫁給爵士，她便全身心做好爵士的賢內助。凱瑟琳評價自己：「我從來都不疏忽，不怠慢，也從不待人無禮——這對一個女人來說被認為是恰當的」（桑塔格·蘇珊等，2002：354）。她極力在外人面前維持一個完美妻子的形象，即使結識了人生知己威廉，也羞於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欲望。可以說，她無時無刻不在貫徹社會為女性定下的準則，卻仍因為夫妻雙方在這種體制下「失去了本該有的善，所以他們婚姻不行，情愛錯位」（年麗麗，夏維紅等，2014：36）。反觀埃瑪，她有過很多任情人，爵士只是其中之一，她從未將自己困在「妻子」這一個身份之中。埃瑪出身低微，為了生計她先後做過「健康女神」、妓女、情婦，埃瑪的命運本來會像那個年代大部分貧窮人家的女兒一樣，為賺錢東奔西走，到了年紀後相夫教子（陳曉峰，仇俐萍等，2011：62-64）。然而，她天生一副好皮囊，做了查爾斯的情婦，後又被查爾斯當作禮物送給了大她三十三歲的男爵用來保證自己對爵士財產的繼承權。埃瑪開始並不喜歡爵士，但她也並未拒絕，並接受著爵士為她準備的一切。她聰明、好學，凡是能提升自己的技能她統統去接觸學習，就這樣她掌握了好幾國語言和樂器，她的表演也得到了眾多認可，使得她在上流社會的交際中如魚得水，甚至得到了王后的青睞。「她已經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的地位在上升。看到爵士如此愛她，她感覺到了自己的優勢。各種技能像鳥一樣飛進來，在她的腦袋瓜裏停下來。她喝飲料，她放聲大笑」（桑塔格·蘇珊等，2002：122），「像很多傳奇式的美人一樣，她不在她所愛的人的身上去尋找美（一個真正的大美人經常有足夠的美供兩個人享用）。她並沒有因為查爾斯體面的好模樣而更喜歡他，也不因爵士是一個胸口凹陷的老頭而少愛他一點」（桑塔格·蘇珊等，2002：122）。

和凱瑟琳相比，埃瑪更像是我們現代人所欣賞的女性。她並不是傳統農業社會中「以夫為綱」的賢妻，在爵士的身心狀況無法再滿足她的需要後，她便不再像教條妻子那樣忠誠與安分，而是跟隨自己的心意與旁人互生情愫並產下一個私生女。爵士臨終前說：「一只手壓著我，但是感情已經沒有了。維納斯似的漂亮女人不會保持忠誠，何況我不是戰神」（桑塔格·蘇珊等，2002：344），「對別人來說，我是一個傻子。她讓別人把我看成一個傻子，她應該受到懲罰」（桑塔格·蘇珊等，2002：346）。從這些描述來看，在爵士的心裏埃瑪絕對算不上是一個好妻子^③。而在民眾的心裏，埃瑪算不上是一個好女人，在那不勒斯革命失敗後，埃瑪和爵士、英雄都參與了屠殺革命者的行動，但她卻是遭受民眾譴責最深的角色，只因她沒有扮演好傳統女性帶孩子、做家務的賢內助角色，轉而去參與政治，和同樣遭人詬病的王后交好，這些在民眾看來都是離經叛



道的反傳統行為，為人所不齒(陳曉峰, 仇俐萍等, 2011: 62-64)。「女人對男人的影響一直就遭人蔑視, 令人生畏, 因為它讓男人變得溫順, 充滿愛意——沒有力量」(桑塔格·蘇珊等, 2002: 221), 「這個女強人過度行使了她的權利, 她超越了適合於女人的許可權(帶孩子、做家務、涉獵某些藝術領域), 變成求權若渴的卑鄙小人。她用她的性手段奴役了一個軟弱的男人, 並腐蝕了一個正直的男人」(桑塔格·蘇珊等, 2002: 282)。自古以來, 女人被社會主流賦予的義務就是襯托男人, 當一個女人對男人的影響過大或女性的風頭勝過男性時, 人們往往會將一切罪責歸因於女人身上, 畢竟這與傳統女性的形象大相徑庭且不為人們所接受。

由此可見, 凱瑟琳和埃瑪在妻子的傳統定位這一點上理解不同, 所作所為亦是大相徑庭。凱瑟琳是順應傳統的賢妻, 而埃瑪是反抗傳統的獨立女性。且埃瑪的表現恰恰反映了作者的認知, 即囿於傳統的女性並不只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才開始尋求反抗, 這種萌芽在 18 世紀末期的歐洲就已經開始出現。

三、感情與欲望的自由表達

自中世紀以來, 面臨基督教和羅馬父權制文化傳統的雙重壓力, 歐洲的女性對於愛情和性的追求長期處於嚴格的限制中。女性通常沒有選擇自己結婚對象的權利, 她們的婚姻主要是「父母之命」, 鮮有愛情可言。在這場被稱為婚姻的合作裏, 婦女的貞操承擔了遠超其現代生理學存在的符號意義, 失去貞操則成為了道德敗壞的代名詞。啟蒙運動後, 伴隨著思想界對「人」的重新發現, 愛情成為婚姻中的重要考量, 此時女性對婚姻的自主性也開始提升。但是, 文化習慣的改變相比社會浪潮總體上更加滯後, 18 世紀的女性仍然面臨著社會對她們忠誠堅貞的期待。《火山情人》中的女性角色就面臨著這種順應規範還是面向自己的艱難抉擇。爵士的第一任妻子凱瑟琳作為傳統封建婚姻的典範, 她與爵士的婚姻始於「門當戶對」, 但是凱瑟琳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妻子」這個角色, 逐漸愛上了爵士。即使與爵士的生活並不幸福, 也沒有任何抱怨。筆者認為, 這種清晰的自我認知和行為的不一致, 主要跟她的成長和受教育環境有關。解決這種不一致的方法就只能是「自我說服」或「自我洗腦」。「哎, 凱瑟琳歎了一口氣, 並注意到自己居然這麼長時間都生活得不幸福, 可又沒有任何權利去認同, 所以她至今還是感謝爵士娶了自己。因為她認為自己不漂亮——因為這種想法揭示出的虛榮心使她瞧不起自己, 她像醜小鴨那樣尊敬她那位高雅的丈夫」(桑塔格·蘇珊等, 2002: 81)。凱瑟琳即使在死去之前仍然想通過寫信來留住丈夫的對她的記憶與愛, 而爵士卻並未來看她最後一眼, 甚至在凱瑟琳生病時多次責怪她的不體面, 只有在失去後才感到了短暫的悲痛。可見, 文學作品中男子薄幸, 古今中外皆然。我們不能通過這些個案簡單歸咎於性別, 但是, 彼時貴族女性的婚姻生活尚且如此, 遑論平民。

值得注意的是, 桑塔格在創造埃瑪這個人物形象的時候, 傾注了自己對於和凱瑟琳截然相反的女性的理解, 或者說希冀。埃瑪出身低微, 家境貧困, 和爵士雲泥之別, 因此他們的結合註定不為世俗所接受和看好, 但埃瑪從未妄自菲薄, 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愛情追求的腳步。我們很難把故事還原到 18 世紀的歐洲, 但我們或許可以做這樣的理解: 底層女性由於沒有受到長年累月的「教育」和「規訓」, 她們身上還帶有天然的革命性。換句話說, 她們本就不太符合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於女性的期待。桑塔格把小說放置在 18 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的義大利半島, 彼時的義大利經歷了歷史的陣痛: 革命、修復和統一。雖然最後沒有被法國吞併, 但是戰爭也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國家, 作為最初資訊革命載體的報業開始興盛, 結合美國女性獨立運動的事實回看, 義大利的報業興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女性主義事業的萌芽和發展。

埃瑪就是身處這段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生逢亂世的她, 前十九年的人生過得顛沛流離, 不得不在不同的男人身邊虛與委蛇, 最終在給查爾斯做情婦的時候墜入愛河, 雖然後來被查爾斯當作禮物送給了爵士, 但她也沒有停止過對查爾斯的愛戀。埃瑪不像其他女人嫁了人後便將全身心都獻給了丈夫, 她最初被送給爵

士的時候，仍舊堅持給查爾斯寫信，期望他能夠回心轉意，這何嘗不是她對愛情的追求呢？（陳榮香，李霞等，2008：43）站在今人的立場，我們也許會對這種道德上的「不完美」持保留意見，但是她追求愛情、獨立和自由的勇氣仍然值得嘉許。

「她在給查爾斯的信中顯得更多的悲傷，更多的痛苦，她告訴她親愛的查爾斯，她屬於他，她只屬於他，沒有人能夠取代他，她告訴查爾斯，她參觀過所有那些奇妙的風景點，並且說，如果有他陪伴，她會更喜歡。她求查爾斯給她寫信；求他馬上就按照原來的約定來那不勒斯，或者派人接她回去」（桑塔格·蘇珊等，2002：116）。

包括埃瑪後來與英雄在一起，這些都是埃瑪對自己感情的自由抒發與追求。伍爾夫提到如果女性要完成感情的自主表達，就需要打破男性語言的桎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話語表達方式（劉美鷺等，2021：139）。埃瑪的一生愛過很多人，她努力爭取了每一段愛情，她沒有受制於社會對她的看法與譴責，真正做到了打破傳統限制，自由表達自己的感情與欲望。這種在今天看來都十分大膽的行為，放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歐洲，其革命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桑塔格的寫作層次是豐富的，小說看似以漢密爾頓爵士為中心，凸顯他身邊不同女性的情感選擇和命運。其實不然，如果我們把埃瑪看成敘事的中心，此時的凱瑟琳、男爵、英雄等男女角色都成了陪襯。其意義不言而喻，這種對於人性、情感和欲望的表達理應被推向敘事的前沿。

四、對傳統母性觀念的批判

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主張不存在天生的、神秘的母性本能，她認為「本能」一詞對人類不適用（西蒙·德·波伏娃，陶鐵柱，1998：326）。「母親的態度，取決於她的整體處境以及她對此的反應」（西蒙·德·波伏娃，陶鐵柱，1998：579）。因此，這是因人而異的。一位母親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在每一個時代都有著定性，任何一個時代都對母親這一個角色下了一個固執的定義，似乎女人生來就註定，有一天要擔任起、履行好母親的責任。但是，一位女性，首先是人，是她自己，然後才是一位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桑塔格在《火山情人》中創造的母親就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

埃瑪的母親卡多根太太非常愛自己的女兒，像大多數人們對母親的定義那樣——母親應該毫無保留地愛著自己的孩子，她也同樣認為「對女人來說，孩子就是她最大的幸福」（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但是卡多根太太也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因為她常常丟下自己的女兒去找自己的心上人，「我認為把她丟一丟沒有錯，畢竟女兒已經十三歲了，何況當她的母親並不是我的全部生活」（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這在別人的眼中是絕對不被允許的，畢竟大家普遍認為母親要以孩子為重。

卡多根太太在獨白中強調了很多次「我是她的母親」，她很在意自己的母親身份，而且她認為只有母愛是至高無上的，她渴望女兒對她給予的母愛表達認可與感謝。母愛是無私的，這是傳統的母性觀念，母親被認為是一味地奉獻且不需要回報的。但卡多根太太認為母愛是需要被讚頌的，是不能被忽視的。且她認為母親不是一個孕育過生命的女性的唯一身份，作為母親也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時間與空間，母親也可以享樂、追求愛情，不必每時每刻都對孩子寸步不離關心備至。卡多根太太對於母親這個角色有著自己的理解，她重視自己的母親身份，同樣也重視自己的個人感受與自由。《火山情人》通過卡多根太太這一人物向我們展現了當時的女性開始對傳統的婚姻和母性觀念持有批判性態度，進而更加關注自己個人的發展與自由。這種追求也暗含了桑塔格的人生態度，我們可以從她的傳記裏看到她對於自己作為女人、作為母親在處理感情問題和親子關係時的深度思考。



五、靈魂獨立與自我實現

「我願意放棄特權,我不懷念過去。我相信未來,我唱我的歌,因而喉頭被割掉了;我看見了美麗的東西,所以眼睛被剮了出來。也許我是幼稚可笑的,但我不讓自己受到迷惑。我從不沉溺於個人的情愛」(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這是《火山情人》中的愛國女詩人方塞卡在死刑前的內心獨白。桑塔格在小說中描繪了一幅 18 世紀歐洲封建社會中的女性眾生相:埃瑪重視個人自由與欲望、凱瑟琳恪守傳統忠誠堅貞等,方塞卡是另一種女性,她是追求進步與獨立。方塞卡自認為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她敢於訴諸法律和丈夫離婚,在法庭上指證丈夫的不忠誠行為,儘管也被丈夫反控花費大部分時間讀書、不信教、與數學老師有染等放蕩行為,但方塞卡最終還是成功與丈夫離了婚。彼時的歐洲,女性主動要求離婚十分罕見,因此方塞卡的行為在當時來看是「古怪」而「放蕩」的。

方塞卡的「古怪」,不僅在於她處理情感問題的果決,她對政治這項傳統意義上便被視為是「男人的事業」顯示出了極大的熱情,並在離婚後專心讀書、寫作、翻譯、搞研究。此外,身為一個女人的她參加了那不勒斯革命,甚至還自稱她「引爆了革命」。方塞卡自幼聰穎,她對國家大事有著自己的見解,不願被蒙蔽,始終保持清醒。她在進行革命的時候全然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女人,敢於和男人平起平坐,從不認為身為女性的自己低於任何男性。儘管方塞卡的行為會為她帶來殺身之禍,但她依然奮不顧身,即使面對絞刑,她也從未後悔參與這場為人民而戰鬥的革命。方塞卡敬佩寫出《女權辯護》的作者蘇珊·沃斯通克拉夫特,但卻拒絕在報紙上提出婦女的權利問題,只因為在她心裏革命事業高於一切,任何阻礙事業發展的個人情感都應該被摒棄,這種思想對於一個 18 世紀的女性來說著實是過激的,但也是進步的。包括從方塞卡對埃瑪的評價「如果把埃瑪·漢密爾頓的國籍變一下,我能夠理所當然地將她想象成一個共和國的女英雄,她會在絞刑架下最勇敢地結束自己的生命(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中,可以看出方塞卡非常欣賞才華和能力都十分出眾的女性,她認為這樣的女性理應擁有更加崇高的事業,而非囿於妻子和母親的身份之中。同樣《火山情人》中的王后也是這樣一位「女強人」,「王后相當聰慧,其程度超過她的夫君,但是王后要為生養相當可觀的子女而操盡心思」(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如果王后不曾被束縛於生兒育女的職責中,相信她也定能有所建樹。方塞卡、埃瑪和王后身上都有著當時的女性所缺少的品質——獨立與進步。

伍爾夫在其著作《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中這樣寫道:「一個女人如果要寫小說,那麼她必須擁有兩樣東西,一樣是金錢,另一樣是一間自己的房間」(Woolf, Virginia, 2003:7-8)。這裏屬於自己的小屋與薪金不僅僅是指物質實體上的,更是指女性個體精神上各個方面的獨立。伍爾夫主張:獨立,對於一個女人來說,是首要的需要。這與我們所論述的方塞卡身上所擁有和堅持的「獨立」是同理的。她的進步在於不僅突破了傳統兩性關係的禁錮,要求在中和男性「平起平坐」,而且將這種模型推廣到了更大的社會舞臺:這一點可以在 20 世紀女性追求政治權利的運動中得到印證。

六、總結

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和社會運動,發展到今天已經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她們不畏懼父權社會體系化的壓迫,在經濟上追求獨立,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在家庭生活中要求實現權力結構的翻轉。在一切向好發展的同時,有許多問題是不能被忽視的。縱觀現在的互聯網,越來越多極端的性別對立話題充斥著賽博空間,而現實生活中的性別衝突、情感糾紛和與性別相關的經濟糾紛、勞動糾紛等話題也屢見不鮮。這一切是否只能有二元對立這一套解法?文學或許能夠提供更加中立和人性化的視角。桑塔格以一個先鋒女性知識

分子、一位母親、一個大學講師和作家和雙性戀者的視角，尋找 18 世紀歐洲女性主義的濫觴，創造出了「火山」「情人」這兩個精妙的喻體。男性為山，女性潛意識的暗流像是火山之中的岩漿，蓄勢待發。桑塔格將這種危險意象與「情人」並置，其用意不言自明——早在工業革命之前，經歷了啟蒙運動和戰亂的義大利土地上的父權之山已被撼動，「她死得很難過，叫我不要把她埋在地下」的凱瑟琳和認為「火山是避難所」的埃瑪的對比，昭示了作者的選擇：突破禁錮才有自由。

然而，這種自由最終指向何方？雖未言明，但是從作者對其他女性的描寫，我們或許可以管窺一斑。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尋求突破兩性對立之後更大的利他主義，是埃瑪和王后都想實現的理想，這種理想的化身——女詩人方塞卡在獨白中寫道「至於當個女人有多麼複雜，我會去哄騙自己。所有的女人都會如此，包括這本書的作者在內」（桑塔格·蘇珊等，2002:395）。這是左翼知識份子代表桑塔格的自白，亦是故事和現實的耦合，女性的個性並非偏見中的愚蠢與情緒化，她們有思想，有追求。此刻的作家桑塔格和女詩人在靈魂上達到了高度的共鳴，她們都是通過文字向讀者傳達女性對自由獨立的嚮往與追求，希望通過作品喚起女性甚至社會對平等的思考。在此，桑塔格和這位理想女性化身的詩人合而為一，展現了女性在掙脫性別桎梏後更進一步的追求——自我實現。桑塔格站在 20 世紀下半葉回望 18 世紀的歐洲，她看到了女性意識的覺醒，見到了自己，也讓讀者感受到了女性主義誕生之前的黎明曙光。

注釋

- ① 健康女神：指埃瑪在一個醫生的客廳裏擺出姿勢充當半裸的女神雕像，自稱可以治療陽痿。詳見桑塔格·蘇珊（著），李國林，伍一莎（譯）：《火山戀人》，北京：譯林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110。
- ② 參見大英百科學術版（Britannica © ACADEMIC）「Italy」詞條。網址：<http://academic.eb.cnpeak.com/levels/collegiate/article/Italy/106448#214430.toc>

參考文獻

- ① Woolf, V. (2003). *A room of one's own & three Guineas*. London: Penguin Books, 7-8.
- ② XU Xiyan. (2022). Female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Taking O-lan in Pearl S. Buck's *The good earth*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014-023.
- ③ 陳榮香，李霞：《論〈火山戀人〉中的兩性關係》，《科技創新導報》，2008 年第 5 卷第 3 期，頁 143。
- ④ 陳曉峰，仇俐萍：《評〈火山戀人〉中的凱瑟琳和埃瑪》，《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11 年第 20 卷第 3 期，頁 62-64。
- ④ 劉美鶯：《論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思想》，《名作欣賞》，2021 年第 27 期，頁 139。
- ⑤ 年麗麗，夏維紅：《真情去向何處？——性別倫理視域下〈火山情人〉中的兩性關係解讀》，《英語研究》，2014 年第四期，頁 36。
- ⑥ 桑塔格·蘇珊（著），李國林，伍一莎（譯）：《火山戀人》，北京：譯林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81-95。
- ⑦ 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1998 年版，頁 309-326+579。
- ⑧ 張亞婷：《「寫作之房間」：當代英國女性文學發展及前景——〈英國女性寫作史，1970 至今〉述評》，《外國語文》，2016 年第 5 期，頁 156-160。

(Editor: Bonnie WANG & Joe ZHANG)